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认同的力量

The Power of Identity(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美〕曼纽尔·卡斯特的著
(Manuel Castells) / 著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凡是读到某本社会学著作的人，都将眼前一亮、获益匪浅。本三部曲更加雄心勃勃、耀眼夺目，它教给了我们许多有关我们这个世界的事情。这一工程的始创者就是才华横溢的曼纽尔·卡斯特。如今，很少再有别的著作敢于把当前发生的如此之多的变化，纳入到一张全景图里头来考察了。这是一个不仅讲述全球经济，而且讲述文化剧变的故事。它是一个传说，不仅叙说了主权国家的衰落，而且叙说了新的权力基础的莅临。再者，它还是一场叙事，不仅关乎计算机技术和媒体，而且关乎这些力量在其中起作用的所有方式。

—— 安东尼·奥鲁姆 (Anthony M. Orum)

《当代社会学》 (Contemporary Sociology)

一部不可多得的巨著。在我看来，它对于当代社会的分析，至少对于一代人来说是最杰出的。

—— 弗兰克·韦伯斯特 (Frank Webster)

《英国社会学刊》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一个让人真正眼前一亮的成就。一位具有超凡把握能力的学者，耗费了毕生的心血，把纷繁复杂的资料归纳到一起，搭建起了一座让人心悦诚服的理论大厦，对正在转变我们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的各种关系，例如进步与反动之间、全球化和分化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全面的描述。

—— 杰明·巴伯 (Benjamin Barber)

《洛杉矶时报》“星期日书评”专栏

(The Los Angeles Times Sunday Book Reviews)

<http://www.ssap.com.cn>

ISBN 7-80230-276-5



9 787802 302761 >

ISBN 7-80230-276-5/D · 048 定价：59.00元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
第二卷

认同的力量

The Power of Identity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美] 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著

曹荣湘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认同的力量 (第二版)

著 者 / 曼纽尔·卡斯特

译 者 / 曹荣湘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编辑 / 钟 敏

责任校对 / 林 毓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32

字 数 / 514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230 - 276 - 5 / D · 04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5 - 286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 1839 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 1842 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 300 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

以20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2003 年版序言与致谢

这是《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第二卷。本丛书提出的分析主题是新的全球社会结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与人们对这一社会结构所暗含的统治形式的反抗之间的矛盾关系。根据我对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趋势的观察，表现形式各异的文化认同（culture identity）是反对那些曾经编排过财富、信息和权力的全球网络程序的价值和利益的一个主要支柱。在全球网络和文化认同之间、社会制度，尤其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其基础受到了削弱，其合法性（legitimacy）受到了挑战。

我尽量避免做出任何预测，因为这超出了一名研究者的任务范围。不过，从 2003 年所处的观察优势来看，似乎在这个信息时代的黎明用来理解我们的世界的理论框架，对于搞清楚我们当前上演的一幕幕戏剧来说也有用处：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和全球恐怖网络（global terror networks）的兴起；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在全球化世界中支撑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一场维护全球公正的多维运动中抗拒无拘束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浪潮；在多元主义时代朝着一种新的制度形式即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演变的、管理全球乱象的国家重建；一些国家尽管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但仍然把自己说成是主权实体的企图。

《认同的力量》完稿于 1996 年 11 月，出版于 1997 年 10 月。新版本完成于 2003 年 4 月，它更新和完善了早些年提出的分析，但基本的论断依然未变。然而，在写作第一版的时候，技术经济方面的社会转型趋势——我把它界定为网络社会的崛起——比反抗这种特殊形式的全球网络社会的举措更加引人注目。因为，按照我的理论方法，社会总是在它们的矛盾的、冲突性的变化中被我们所理解，我也确实觉察到了另类社会运动的各种萌

芽，以及民族国家危机的各种征兆。不过，在我的作品中同样重要的是我的方法论原则，它反对任意推测和社会预言，力求在我的知识和能力范围内依据观察来建构理论。因此，尽管我分析过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种族动员、反全球化运动（例如墨西哥萨帕塔主义 [zapatistas]）等各种反对新的全球无序状态的运动，但要完整地描画出这些社会运动的轮廓，并勾勒出国家制度在新的国际公共空间中转型的后果，则为时尚早。

如今，我们已经可以拿出证据来表明这一点，即出现了各种反对一元化逻辑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挑战，而这种一元化逻辑在网络社会的初建阶段一直处于支配地位。这个新的版本有它自己的用处：更加完整地整合各种有关冲突性的反抗过程的分析，以及有关社会组织的替代方案的分析，而这种整合所依据的基础，则是对这些过程在世纪之交的发展所作的翔实观察。由于这个原因，我并没有全部更新本卷的资料和参考文献。写作这个三部曲以及本卷的目的，是提出分析，而不是堆积文献。因此，在我花费了15年的光阴来研究和写作这个三部曲的内容之后，我并无意在我的余生里继续追踪这些事件。有鉴于此，我没有给有关父权制危机（the crisis of patriachalism）的分析和有关环境运动（environmental movement）兴起的分析增加什么新的内容，而是让这两章保持原封不动。但我在那些既能够确凿无疑地证实以前提出的分析又能够获得对关键论点加以修正的领域，确实也进行了新的研究，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首先属于这么做的领域，就是对反全球化社会运动的分析，以及对信息政治（informational politics）条件下的民主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的研究。因此，我特意增加了对基地组织（al-Qaeda）的分析，它是一场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运动；还增加了对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运动的分析，它把不同的反抗潮流汇聚到一起，意欲倡导各种另类的社会组织方案（用它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因此是一种集体性的社会运动。事实上，网络社会并没有脱离开贯穿人类历史的普遍的社会规律：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反抗，哪里也就有关于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各种竞争性主张和方案。我还进一步修改了我对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讨论，这种危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在全世界所有的地区都有所加深，并且往往是沿着我所分析过的路线逐步恶化的，这条路线就是：这场危机是和媒体政治（media

politics)、丑闻政治 (scandal politics) 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有待管理的议题的全球性与负责管理的制度的国家边界特征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我做了新的工作——也就是说,需要对已经提出来的分析框架加以重新思考——的领域,就是在网络社会中研究国家问题。在我的三部曲的第一版中,我提出了网络国家的概念,用它来指代政治机构为应对全球化挑战而采取的变通形式。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即民族国家并没有趋于消失,而国家的角色在我们的世界中也和在人类历史上一样,依然处于核心地位。不过,如今的国家和现代时期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并不属于同一类型,同样的,这种国家也区别于以往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其他国家类型。我把这种新型的(政治机构意义上的)国家从理论上归纳为网络国家,它由一系列互动主体的复杂网络所构成,这些互动主体包括民族国家、各种“多国家的”(conational)和“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机构、区域的(regional)或地方的(local)政府,甚至也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NGOs),因为地方的和全球的公民社会很快变成了民族国家的挑战者,同时也很快变成了民族国家的合作者。在本卷中,我将进一步分析政治管理、政治统治和政治表达之间的全球相互依赖,也将尝试着提出用于思考新的国家现状的理论解释。

像所有的知识产品一样,本卷的第二版也打上了写作时的社会背景烙印。这个背景就是基于认同的挑战与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各类机构之间的公开冲突,前者的例子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全球恐怖网络,而后者则以近来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为靠山。这个背景还包括:尽管从全球网络社会当中产生出来的各种议题,均带有客观的多边特征,但惟一相对自主的民族国家即美国,却决心向着单边世界统治做最后一次奔跑。可惜的是,这种单边世界统治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争端所包围,尽管有了英国人的携手相助,但一旦面对一个真正危险的、从来没有被全球统治精英当中的战略家和思想家玩弄过的新世界,统治者们就会坐立不安,犹如惊弓之鸟。

美国不去理解这个新世界,也不去寻找解决其问题的新途径,却决心利用它的以技术优越性为基础、从而以它在技术革命上的先行一步为基础的军事优势,来使这个世界适应于它本身,适应于它的利益要求,适应于

它的思维方式、存在方式。这一点，我在第一版的分析当中并没有提到（但这点并不同于来自原教旨主义恐怖网络的粗暴挑衅，这种挑衅与我在1996年提出的看法完全吻合，尽管我不想预测任何东西）。从理论上说来，我研究了新社会结构的形成与扩展，但对各种主体的自主性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不过，我们知道，在社会理论当中，任何分析都必须把社会实践形成过程当中的结构逻辑（the logic of structure）和主体逻辑（the logic of agency）归纳到一起。我把这一原则放在了我的理论的突出位置，并且试图把这一原则贯穿于有关网络与自我之间、资本主义网络的力量与认同的力量之间、公司全球化与另类的全球运动之间的矛盾逻辑的讨论当中。但我也低估了国家的能力，尤其是最近的主权民族国家的能力，它们确实能够无视历史信号，重新垄断作为其存在根基的暴力工具，并且依靠扮演其国民和附庸国的保护者角色来获取国内的合法性，牺牲国际的合法性。一种单边的逻辑如何能够在一个多边的世界里继续存在下去，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它的答案只有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观察和分析才能在未来年份里告诉我们。但是，为了帮助引导这样一种分析，我在本卷中将会提出一些理论的反思，而引发这些反思的，则是对结构逻辑和主体逻辑在建构我们的世界的过程中发生这种基本矛盾的第一阶段所做的观察。

在对本卷进行修订的过程中，我继续得益于我的学生、同事和多家学术机构的支持。我必须承认他们所作的贡献，而我对他们所有人的感谢也应该采取公开方式。首先，我的感谢之情给予我的研究助手们，他们帮助我收集和分析了新的数据。他们都是我的博士生：杰夫·朱丽丝（Jeff Juris）、拉纳·托马纳（Rana Tomaira），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伊斯特万·欧利奥（Esteve Ollé），就读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远程大学（Universitat Oberta de Catalunya）。

我的许多同事也以他们关于本卷所涵盖的主题的评论、信息和建议帮助了我，尤其是：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费尔南多·考尔德伦（Fernando Calderon），鲁斯·卡多索（Ruth Cardoso），威尔马·法里亚（Vilmar Faria），埃米利奥·德艾波拉（Emilio de Ipola），尼可·克罗特（Nico Cloete），约翰·穆勒（Johan Muller），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孙友琴（You-tien Hsing），费尔

南多·卡多索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玛丽·卡尔多 (Mary Kaldor), 伊马·图比纳 (Imma Tubella), 彼得·埃文斯 (Peter Evans), 哈利·夏肯 (Harley Shaiken), 尼扎·阿萨伊德 (Nizar al-Sayyad), 罗纳德·英格哈特 (Ronald Inglehart), 盖伊·本维尼斯特 (Guy Benveniste), 瓦伊尼·巴科 (Wayne Baker), 约翰·汤普森 (John Thompson), 皮卡·西蒙尼 (Pekka Himanen), 马加里·桑切斯 (Magaly Sanchez), 比什·桑纳尔 (Bish Sanyal), 威廉·米切尔 (William Mitchell), 道格拉斯·马瑟 (Douglas Massey), 埃尔基·托米奥亚 (Erkki Tuomioja), 欧天瑟·坎拉坦 (Ovsey Shkaratan), 纳西斯·塞尔拉 (Narcis Serra)。

我同样感谢下面这些大学、机构和基金会, 依靠它们的邀请, 我得以有机会在修订本卷期间就本卷所提出的观点进行深入讨论。它们是:

南非高等教育转型研究中心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South Africa);

联合国玻利维亚发展项目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Bolivia);

联合国智利发展项目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Chile);

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

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s, London);

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艺术和建筑》期刊 (Ord&Bild Journal, Goteborg and Stockholm);

阿姆斯特丹巴里文化研究中心 (Balie Cultural Center, Amsterdam);

马德里马塞利诺·博丁基金会 (Fundacion Marcelino Botin, Madrid);

巴塞罗那企业管理高等学校 (Escuela Superior de Administracion de Empresas [ESADE], Barcelona);

巴塞罗那地中海欧洲学院 (Institut Europeu de la Mediterrania, Barcelona);

柏林洪堡大学 (University Humboldt, Berlin);

慕尼黑大学 (University of Munich);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米兰伯克利大学 (University Bocconi, Milan);

莫斯科经济高等学校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Moscow);

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安大略皇家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Ontario);

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洛杉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阿隆伯格通讯学院 (Annenber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我将同样愿意强调我的新学术环境对我的研究所作的贡献。这个新环境就是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远程大学 (UOC)。我是 2001 年来到这里的,一到这里,我就寻到了我自己的认同之根。这给我推进我对网络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维度的分析,送来了个人的激励和十分好的优势位置。我尤其要感谢副校长伊马·图比纳 (Imma Tubella) 和校长加布里尔·斐拉特 (Gabriel Ferrate), 他们给我本阶段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智力、物力和人力条件。

我还想重申我对埃玛·基谢廖娃-卡斯特 (Emma Kiselyova-Castells) 的个人歉意,她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再容忍了我对这三部曲所做的无休无止的工作。我向她保证:再也不会会有三部曲了!

最后,我的医生,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的彼得·卡罗尔 (Peter Carroll) 和詹姆斯·戴维斯 (James Davis), 值得我再表达一次谢意。他们替我赶走了我们都在与之战斗的病魔。

我特别希望这个实实在在修订过的版本所提出的分析,能够帮助读者理解这个十分麻烦的世界。

曼纽尔·卡斯特

2003 年 4 月

于西班牙巴塞罗那

作者和出版社十分感谢下面这些材料复制权的授予者:

图 2-1 依据每个州的爱国者团体数量和准军事训练基地数量绘制的

爱国者团体地理分布图, 1996 年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atriot Groups in the US by number of groups and paramilitary training sites in each state, 1996,” from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Klanwatch/Militia Task Force 1996)。授权复制。

图 4-1 意大利、联邦德国和瑞典的婚姻维持曲线: 1934~1938 年和 1949~1953 年出生的母亲的人数 (H-P. Blossfield, “Marriage survival curves for Italy, West Germany, and Sweden: Mothers born in 1934-38 and 1949-53,” from H-P. Blossfield, *The New Role of Women: Family Formation in Modern Societies* [Westview Press, 1995])。授权复制。

图 4-2 1960 年以来欧盟国家中初次结婚比例的变化 (I. Alberdi, “Evolution of first marriage in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since 1960,” from I. Alberdi [ed.], *Informe sobre la situacion de la familia en España* (Ministerio de Asuntos Sociales, Madrid, 1995)。

图 4-5 1960 年以来欧盟国家中的生育综合指数 (I. Alberdi, “Synthetic index of fertility in European Countries since 1960,” from I. Alberdi [ed.], *Informe sobre la situacion de la familia en España* (Ministerio de Asuntos Sociales, Madrid, 1995)。

图 4-10 同性性关系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 (E. Laumann et al., “Interrelation of different aspects of same-gender sexuality,” from E. Laumann et 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授权复制。

图 4-14 一生中发生口交的比例, 依据性别分组 (E. Laumann et al., “Lifetime occurrence of oral sex, by cohort: men and women,” from E. Laumann et 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图 5-1 一般的政府财政总负债, 占 GDP 的百分比 (“General government gross financial liabilities [% of GDP],” from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London, January 20, 1996)。授权复制。

图 5-2 制造业中的劳动成本, 1994 (美元/小时) (“Labour costs in manufacturing, 1994 [\$ per hour],” from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London, January 27, 1996)。授权复制。

图 6 - 2 美国不同时期发生腐败案的平均次数，1890 ~ 1992 年 (T. Fackler and T-M. Lin, "Average number of corruption stories per periodical in US, 1890 - 1992," from T. Fackler and T-M. Lin,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929 - 1992," fro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7 [4]: 971 - 993 [1995])。授权复制。

我和出版社尽力搜寻过所有的版权持有者，但如果有任何无意中的疏忽，出版社都将乐意在第一时间作出必要的安排。

1996 年版致谢

本卷提出的观点和分析源自我 25 年来对世界各地社会运动和政治进展的不懈研究。不过，如今在这个三部曲中，我还是把这些社会运动和政治进展放到了一个更宽泛的信息时代理论框架中进行再次检验和全面梳理。许多学术机构为我开展这个独特的研究领域的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巴黎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社会运动研究中心 (Centre d'étud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该中心由阿兰·图海纳 (Alain Touraine) 所建立和领导，1965 ~ 1979 年我曾在这里的一名研究人员。其他对我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学研究有过帮助的研究机构包括：

智利天主教大学城市发展多学科研究中心 (Centro Interdisciplinario de Desarrollo Urbano, Universidad Catolica de Chile)；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研究学院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ales,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香港大学城市研究中心 (Center for Urb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马德里自治大学新技术社会学学院 (Instituto de Sociologia de Nuevas Tecnologias,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Madrid)；

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系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kyo)

本书的最后修改和写作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可以说，从 1979 年以来，这里就是我的学术之家。许多观点都在我的研究生班“信息社会的社会学”上讨论和推敲过。在这方面，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是我的工作不竭的灵感之源、思想之源。本卷还得益于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研究生、未来的杰出学者桑德拉·穆格 (Sandra Moog) 在研究上的额外帮助。此外，同样来自伯克利分校

的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博士生柏兰芝也提供了可贵的学术帮助。埃玛·基谢廖娃 (Emma Kiselyova) 在包括其他两卷在内的我的整个工作当中, 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她给我带来了接触我不懂的语言的方便, 也对本卷各部分内容提供了评价和注释。

许多同事阅读了全书或个别章节的初稿, 并作出了广泛的评论, 帮助我改正了一些错误, 使我的分析更紧凑。当然, 我明显要为最后的解读负上全部的责任。我要感谢的人包括:

伊拉·卡茨内尔森 (Ira Katznelson), 伊达·萨瑟 (Ida Susser), 阿兰·图海纳 (Alain Touraine), 马丁·卡诺伊 (Martin Carnoy), 斯蒂芬·科亨 (Stephen Cohen), 阿莱加德拉·莫伦诺·托斯卡诺 (Alejandra Morenno Toscano), 罗伯特·拉塞纳 (Roberto Laserna), 鲁拉·萨迪克 (Rula Sadik), 孙友琴 (You-tien Hsing), 矢泽次秀郎 (Shujiro Yazawa), 夏铸九 (Chu-joe Hsia), 南希·惠蒂尔 (Nancy Whittier), 芭芭拉·爱泼斯坦 (Barbara Epstein), 戴维·胡森 (David Hooson), 艾琳·卡斯特 (Irene Castells), 伊娃·塞尔拉 (Eva Serra), 蒂姆·杜安 (Tim Duane), 埃尔西·哈伯-安德森 (Elsie Harper-Anderson)。

我希望向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Blackwell) 的责任编辑约翰·戴维 (John Davey) 表达我的由衷谢意, 他为本书的许多关键部分献出了自己的专业洞见和建议。

这也就是说, 本卷和其他两卷一样, 思考和写作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集体工作, 尽管最后署名的只有作者一人。

曼纽尔·卡斯特

1996年11月

于加利福尼亚, 伯克利

目 录

2003 年版序言与致谢	1
1996 年版致谢	1
导言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	1
共同体的天堂：网络社会中的认同与意义	4
认同的建构	5
神的天堂：宗教原教旨主义与文化认同	11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还是 共同体的想象	29
种族解放：网络社会中的种族、阶级与认同	56
地域认同：地方共同体	64
小结：信息时代的文化共同体	69
地球的另一面	
——反对新全球秩序的社会运动	73
全球化、信息化与社会运动	73
墨西哥萨帕塔：第一场信息化的游击运动	77
拿起武器反抗全球新秩序：美国民兵与爱国者运动	90
天启的喇嘛：日本奥姆真理教	106
基地组织、“9·11”及其他：假借真主名义的全球恐怖 活动	113
“没有发言权就不要全球化！”：反全球化运动	148